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CONTENTIOUS POLITICS

抗争政治

Charles Tilly Sidney Tarrow

[美国]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著 李义中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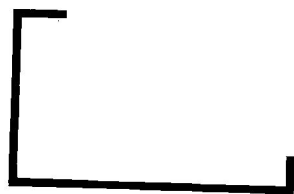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抗争政治

[美国]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著 李义中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争政治/(美)蒂利(Tilly, C.), (美)塔罗(Tarrow, S.) 著;李义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6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Contentious Politics
ISBN 978-7-5447-1208-8

I. 抗… II. ①蒂… ②塔… ③李… III. 政治—研究—世界 IV. ①D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7583号

Contentious Politics by Charles Tilly & Sidney Tarrow
Copyright © 2007 by Paradigm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radigm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264 号

书 名 抗争政治
作 者 [美国]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译 者 李义中
责任编辑 黄 颖
原文出版 Paradigm Publishers,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2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08-8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致道格，

我们默默的合作伙伴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提出要求	005
第二章 如何分析抗争	034
第三章 政权、剧目与机遇	056
第四章 抗争互动	086
第五章 动员与遣散	110
第六章 社会运动	136
第七章 致命性冲突	165
第八章 混合政权中的抗争	201
第九章 抗争的现在与未来	227
附录 A 概念与方法	247

附录 B 抗争之流、抗争片段、机制及过程	261
参考文献	269
索 引	292
译后记	309

前 言

近年来,许多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生开始对本书的两个主题产生兴趣,这两个主题分别是:抗争政治与借助备细说明的机制与过程对重大政治事件加以解释(的方法)。如你们很快将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学者、新闻记者以及普通公民们一直在研究一种或另一种类型的抗争政治,然而,只是在最近,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专家们才努力设法在人类行为的通则(就人类行为的通则而言,任何一种政治斗争都不过是一个特殊案例而已)与有关革命、内战、社会运动以及每一其他形式的抗争之个别概括间,找出一种中间立场。抗争政治方法着意寻求的是存在于大量政治斗争中之因果关系方面的相似性,而并不意图找寻统摄所有政治(行动)之通则。它通过辨识那些在殊为不同的冲突与合作中,以相似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关键机制与过程——例如,不久你将会碰到的居间联络机制和动员过程——来达到此一目的。本书则是将这两种方法的基本要素集合到了一起。

几年前,我们曾做出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初步尝试,但此一尝试仅获得部分成功。2001年,与作为世界著名的抗争政治分析大家之一,斯坦福大学的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联手合作,我们撰写了《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该书曾激起一场热烈的学术讨论,甚至是那些对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深表同情的专家学者,也对该书提出了三点合理的异议。首先,该书述及12种机制与过程,却未曾对其加以细致的界定,也未能提供翔实的证明,遑论精确地显示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了。其次,该书对于从事抗争政治研究的学生及学者们可据以检测其解释之可靠性的方法与证据,依然不甚了了。第三,该书未能对其要义作直截了当的陈述,而是沉醉于复杂的情况,不着边际的铺陈与实际例证之中。

xi 在这本新著中,我们力图克服这三点不足。我们对要加以探究的机制与过程在数量上做了限定,而且尽我们所能地对它们做出清晰而一以贯之的描述。而对于那些可以据之检测我们所作解释之可靠性的方法与证据,我们也做了强调,同时,将我们的要点在本书的两篇附录中作了概括和总结。最后,我们按部就班地推出抗争政治方法,先从基础性叙述开始起步,继而通过拓展延伸与具体应用继续推进。我们还先后两次对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分别见第九章和附录。

不过,我们并未满足朋友及批评者的所有批评和反对意见,譬如,本书主旨在于辨识和阐明贯穿于文中的一些分析性要素,诸如抗争之流、事例(episode)、机制、过程以及结果。对它们逐一进行经验式的确证,则意味着要么另写一本书,要么便是让本书的篇幅呈指数式的扩展。我们也并不试图对世界上发生的所有抗争政治做均衡式的叙述,而更愿意将记述重点放在那些我们已对其做过研究以及熟知其语言的地区上。

第一次接触本书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出现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大量概念令人望而生畏,但大可不必为此而气馁:把这些概念当作工具而不是把它们看成规则即可。你们应当运用这些概念去理解据以阐明我们对有关抗争政治加以解释的具体叙述,而且,当你们研究抗争政治的事例时,这些概念也应该对你们有所助益。

让我们立即着手来清除一个经常出现的误解。我们两人所从事的

研究工作都属于被其他许多人简称为“社会运动”的研究领域,而我们俩也都认为社会运动的确存在,且具有其突出的特点,本书的第六章即直截了当地论及社会运动。我们甚至还撰写过有关社会运动的专著:塔罗(Sidney Tarrow)的《运动中的力量》(*Power in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 1998)以及蒂利(Charles Tilly)的《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 1768—2004*,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但是在本书中,我们的做法却不是将所有的民众动员一并纳入社会运动这一容器中,而是把社会运动置于种类更为繁多之民众斗争的背景下来加以研究,我们既表明了它们的共性也指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希望从事社会运动研究的学人们把本书与他们最喜欢的社会运动研究著作放在一起读,而在他们做这种对照阅读时,我们希望他们会认识到存在于社会运动与其他形式的抗争政治之间的相似、差异以及二者间的联系。

从以下这些人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可或缺的信息、建议、帮助、批评和鼓励,他们是:罗恩·阿明扎德(Ron Aminzade)、肯尼思·安德鲁斯(Kenneth Andrews)、卡伦·贝克威思(Karen Beckwith)、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迪安·伯肯坎普(Dean Birkenkamp)、查尔斯·布罗克特(Charles Brockett)、安杰拉·卡特(Angela Carter)、安妮·科斯坦(Anne Costain)、多纳特拉·德拉·波特(Donatella della Porta)、米凯尔·埃里克森(Mikael Eriksson)、列夫·格林伯格(Lev Grinberg)、克雷格·詹金斯(Craig Jenkins)、玛丽·卡赞斯坦(Mary Katzenstein)、安杰拉·金(Angela Kim)、伯特·克拉德曼斯(Bert Klandermans)、卡利·科尔塞(Karrie Koesel)、汉斯彼得·克里斯(Hanspeter Kriesi)、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莉莲·马蒂厄(Lilian Mathieu)、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戴维·S. 迈耶(David S. Meyer)、玛丽简·奥萨(Maryjane Osa)、迪特尔·鲁赫特(Dieter Rucht)、萨拉·索尔(Sarah Soule)、萨拉·塔罗(Sarah Tarrow)、彼得·沃伦斯坦(Peter Wallensteen),以及愿意花费时间

来分析我们研究结果的学生们。我们最为感激的则是并未参与本书写作的我们默默(但也未必真的沉默无声)的伙伴道格·麦克亚当。道格因忙于“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事务而无法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特殊冒险,但他还是以拉拉队队长、批评家和朋友的不同身份给予我们这次行动以关注,同时他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他那众所周知的仁善。

xiii

第一章 提出要求

1

1785年,当一位名叫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的英国神学专业的年轻学生,以一篇有关奴隶制的文章而赢得剑桥大学拉丁文优秀奖(Latin Prize)时,他和他的听众们都未曾想到这篇文章将施于英帝国范围内之奴隶制的影响。不过,当克拉克森在赶往伦敦就任新教牧师之职的途中,停下来坐在路边的他却思绪万千,假如他所揭示的有关奴隶制的恐怖景象是真的,“那现在就该是有人着手去终结这些灾难的时候了”(Hochschild 2005:89)。

克拉克森最终证明他自己就是那个人。与一小批提倡反奴隶制的同道一起,他最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职业组织者。克拉克森撰写了数千封信件、组织请愿行动,并且帮助发起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跨国运动。这一运动终结了罪恶的奴隶贸易暴行,使奴隶制在环大西洋地区得以废止,此举也使英国的改革者们得以宣称其对于新获独立然而却保留了奴隶制的美国拥有道义上的优越性。反奴隶制运动历经许多阶段,在奉行压制政策的拿破仑战争时期一再遭受逆转,在美国则更是需要一场严酷的内战才使那里的奴隶制度得以终结。不过,在18世纪的英格兰,该运动却将宗教福音运动、天主教徒的政治解放以及议

会改革结合起来,造就了现代社会运动的模式。

- 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而言,当年那场由克拉克森和他的朋友们发起的运动不免显得有些温文尔雅甚至保守,然而,他们在提出要求时的做法却与当今时代的社会运动毫无二致。他们促成组建委员会,在报纸上做各类广告,发动请愿宣誓,收集证据并将其呈交下议院。尽管就“杯葛”(boycott)这个词而言要等到下一世纪才进入英语语汇,但当时的他们已然组织起一场针对由奴隶所生产的食糖采取实际上联合抵制的行动。不列颠的反奴隶制积极分子们还通过展示奴隶拥有者们折磨拷打奴隶时所使用的器具,让这个国家的民众受到良心上的巨大冲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与议会内及文学界的奴隶制反对者们诸如威廉·威尔伯福斯、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结成同盟;而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共和派宣称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人权”的一个短暂时期里,他们甚至还将克拉克森派往法国,以帮助那里的反奴隶制力量(Drescher 1991)。
- 2

不列颠的反奴隶制运动耗时近乎 20 年,才使大西洋奴隶贸易得以终结,而整个不列颠殖民地奴隶制的终结则还要再往后推迟 30 年。不过,就在克拉克森和他所在的委员会发起这场运动后不到一年,“不列颠的民众就在伦敦的各种辩论社团、一些地方小酒馆以及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向奴隶制发起了挑战”(Hochschild 2005: 213)。而在新独立的美国,奴隶贸易的反对者们也将最终说服国会宣布这项贸易为非法,尽管它还需要发动一场内战才能终结南部的奴隶制。就这样,克拉克森、其盟友和敌人以及大西洋两岸的一些公共权力机关就一起介入到严肃的政治活动中了。

关于反奴隶制运动,我们可以做出许多不同的描述。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道德故事,说它所展示的是人们在面临困境时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所能达成的业绩;也可以将其视为一次开明价值观的应用、一种宗教热情的表达,抑或是英国的资产者们企图推进劳动力自由与贸易自由而做出的努力;我们还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跨国社会运动的

早期实例,而今,它已是全球化时代的重要现象。欧洲和美国的反奴隶制运动的不同观察者们向我们讲述了所有这些故事以及其他更多的故事,在此,我们将其视为**抗争政治**的一个戏剧性的实例,一场围绕着何种政治方案终将占上风而在人们之间展开争斗之实例。

再来看另一个抗争政治的戏剧性事件,一场 2004 年急速降临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抗争政治事件。广大民众才脱离苏联统治 10 年,乌克兰的统治者,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便施以腐败、选举欺诈以及政治犯罪,其政权代理人从反对党的手里窃取了大选成果,并且用二恶英(dioxin)对反对党候选人尤先科(Victor Yushchenko)下毒。为回应这一腐败选举结果,同时也由于得到外国观察员及邻国的支持,义愤填膺的市民们纷纷涌上了首都的街道,他们在 11 月的寒冬彻夜唱着、喊着,封锁住通向政府大楼的通道,发动了被称为“橙色革命”的行动。乌克兰的抗议活动与 2000 年发生在塞尔维亚与 2003 年发生在格鲁吉亚的事件类似,都属于针对选举欺诈的民众抗议潮,扩散至整个前苏联及其邻近地区。

3

不过,“橙色革命”却以失败告终。就在抗议者拥塞基辅的诸多街道之际,超过 1 万人的内务部军人也匆忙登上卡车,打算用武力对付这些抗议者。“当军队开始向基辅城中心开进时,”奇弗斯(C. J. Chivers)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基辅正趋于一场可怕的冲突,一场足以引发内战的苏联式的镇压。”(Chivers 2005)然而事情的结果却出乎所有局外人的意料,尽管新闻界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显而易见的街头抗议行动上,但这个冬月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却远不止如此:

- 一批军官“将信息透露给库奇马先生的对手,为反对派要人及反对派的示威行动提供安全保障,他们还明确表示其不愿遵守政府当局为镇压路线而精心设计的公开信号,并且与政府官员们展开激烈的心理较量,以减弱对抗议者的不利反应”(Chivers

2005)。

- 在整个危机期间,“由一小批乌克兰高层情报官员发动的内部斗争也在进行,他们决定不听从列昂尼德·库奇马总统政府的计划安排,将权力转交给……总统选定的继任者”(Chivers 2005)。
- 与此同时,“警官学校的学员们则公开鼓动人们支持尤先科,并号召防暴警察们改变立场……当1万名内务部军人在11月28日被动员起来去镇压发生在‘独立广场’的抗议活动时,乌克兰安全部(SBU,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则早已预先对反对派领导人发出了有关镇压行动的警示”(Chivers 2005)。
- 情报部门高级官员们被以非正式的形式告知正在发生的事态,他们发疯似的通过电话以劝说内务部撤回其军队。就在示威者们举行游行、反复呼喊(口号)、唱着歌曲以及为了御寒而搓着双手时,乌克兰安全部的一位密探也在示威人群中活动,提醒人们注意即将临近的镇压。

事情还不仅止于此:在幕后,抗议者和支持他们的部队军官们得到了乌克兰社会许多部门及其成员,其中包括一些此前曾支持过库奇马腐败政权的狡猾“寡头政治集团成员”的赞许。

- 外部行动者们也参与其中:来自欧洲的选举监察员以及民主制的拥护者们支持反对派。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支持现政权一边,普京甚至在
- 4 有报告称乌克兰大选存在人为操纵和舞弊行为时,仍然宣布支持现政权支持的候选人。在“橙色革命”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发生在争取进步的社会运动与黑暗的反动势力之间的两极斗争,而是一场多面向的抗争事件。盟友与敌人、“好的”与“坏的”行动者,局内人与局外人、参与者与旁观者,都相互交织地出现在一个提出要求的过程中,我们称之为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

发生在 18 世纪英格兰的反奴隶贸易运动与 2004 年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有何共同之处呢？尽管我们能够辨识出其不同之处，但这两场运动也在许多方面异曲同工。这两场运动都针对当局提出了自身的要求，在提出要求时都采用了公开行动的方式；两场运动不仅都利用了传统的集体行动[我们称为**抗争剧目**(repertoires)]形式，还创造出一些新的集体行动形式；它们还都分别与各自所在政治体内有影响的成员结成同盟，利用现政权内出现的机遇并制造一些新机遇，结合制度性与超制度性的(extrainsitutional)常规做法以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所从事的是**抗争政治**。

抗争政治包含着这样一些互动：在其中，行动者提出一些影响他人利益或导向为了共同利益或共同计划而做出协同努力之要求；政府则在这些互动中作为所提要求的对象、要求之提出者抑或第三方而介入其中。抗争政治由此而将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生活的三个特征：抗争、集体行动以及政治，聚合到了一起。

抗争涉及的是提出对其他人之利益产生影响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抗争的范围变化囊括了从诸如今晚我们应看哪个电视节目之类的小事，到你的姐姐(或妹妹)休(Sue)是否应该嫁给正在和她约会的那位男士之类较大的问题。但抗争也会发生在足球比赛中、竞争性的商业广告活动中以及爱吵闹的病人与易怒的大夫之间。

在最简单形式的抗争中出现的情形是，一方针对另一方提出自己的要求。抗争中的双方常常是个人，但其中一方或另一方也可能是一个群体甚或是一个机构；你可能向你所在的学校提出你的要求，或者可能为获取失业救助而向政府提出要求。在这种最基本的抗争形式中，我们可以将一方视为主体(要求之提出者)，另一方视为客体(要求之接受